1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安定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国民经济调整的巨大任务》

1981年到来了。这是中国人民在粉碎“四人帮”以后迎来的第五个新年。从1976年10月的胜利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拨乱反正，在端正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以及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等方面，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我国各方面的面貌起了显著的变化。多难的祖国终于一步一步走上了中兴之路。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政治形势和经济形势都是很好的。去年一年里，党的五中全会产生了中央书记处，又通过了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党中央政治局在8月召开的扩大会议，和随后举行的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分别决定了并开始执行了党的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的民主化改革，着手废除实际存在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庄严审讯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即将依法给他们以罪有应得的制裁。在经济方面，农业生产有了比较快的发展，绝大部分农民的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工业生产在能源几乎没有增长的情况下，仍然保持了一定的增长速度，特别是轻工业生产增长的幅度更大。由于轻工业增长幅度大，农副产品增多，市场供应是20年来比较好的。城市大多数职工由于调整工资，实行奖励制度，增加就业人数，生活有所改善。这些成绩，都是有目共睹的。

但是，在开始前进的道路上，事情并不是也不可能在一切方面都一帆风顺。全国的经济形势很好，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在这种很好的经济形势下却潜伏着一种危险，这就是财政大量赤字，货币发行过多，物价相继上涨。如果不对此采取断然措施，三中全会以来农民和职工在经济上得到的好处就会失掉，正在日益好转的局势就会再次遭受挫折。

为什么在粉碎“四人帮”四年以后，还会潜伏着严重的财政经济危机呢？问题要从历史来看。我国建国以前，经济生活早就存在着多方面严重的不平衡。大家记得，在解放前夕，国民党统治下的长期恶性通货膨胀曾经威胁着全体居民的生存，这种灾难曾经继续到建国初期。党和人民政府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用极大的努力迅速扭转了局势，恢复了国民经济，并且接着转入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即1953年至1957年期间，我国的经济发展是稳定而迅速的。但是在这以后，由于党和政府的领导一心想加快经济发展，以便早日把中国建成为现代化的富强国家，而在着手实现这个良好愿望的时候，没有严格地从客观的经济情况和经济规律出发，以至在经济工作中长期存在着“左”的错误。当然，必须着重指出，过去20多年中的经济工作，决不是只有错误的一面，没有正确的一面。我们取得的成就仍然是巨大的，我们的经济发展，包括人民生活的改善，比之其他条件相近的发展中的大国仍然快得多。要不是由于这些错误，社会主义制度一定会使我们取得更大的成就。过去的错误在各个阶段也有程度轻重的不同，表现形式的不同。突出的错误是50年代后期“左”的错误，这个错误虽然在1962年至1966年期间得到了纠正，但是并没有从思想上正本清源，没有从根本上批评凭主观愿望规定发展速度这个错误的指导思想。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头两年，我们没有足够估计十年破坏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也没有清理经济工作中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还是急于求成，又提出了一些过高的不切实际的口号和目标，把已经超过国家财力可能的基本建设规模又大为扩大了。我们打破闭关自守的局面，利用外资，引进技术，这个决策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由于缺乏经验，进口成套设备的规模过于庞大了，超过了实际的需要和可能。这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复出现的旧错误，加剧了比例关系的失调，加重了财政经济的困难。三中全会以后，中央确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这本来应当成为经济建设工作的一个根本转折。但是，近两年来，从中央到基层的许多同志，包括一些经济战线的各级领导同志，对经济调整方针的认识既不充分，执行也不得力。一方面提高了城乡人民的消费水平，另一方面却没有使基本建设的总规模退下来，有些地方和企业又盲目地上了一批重复建设项目；一部分生产企业没有按照经济条件进行必要的调整；行政管理费用的增加也超出了财政的负担能力。这样，在分配上，积累和消费的总和就超过了国民收入，国家安排的基本建设开支和其他各项开支也超过了财政收入。这个基本情况，在去年9月五届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国民经济计划报告和国家预决算报告中已经向全国人民说明了，但是当时所采取的对策仍然很不彻底。因此，虽然经过近两年的调整，整个经济的被动局面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过来。财政收支既然不平衡，货币的发行量就要不适当地增加，加上企业管理、商业管理等方面的原因，这就造成了过去一年中的物价上涨。

现在，为了使整个国民经济从被动转入主动，使财政收支和信贷收支从不平衡转入平衡，使四个现代化的建设得以在稳定的基础上健康前进，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实行进一步的认真的调整。主要是基本建设要退够，行政费用要紧缩，生产建设、行政设施、人民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活的改善，都要量力而行，量入为出。某些方面坚决退够，才能使整个国民经济摆脱潜在的危险。其他方面，主要是农业、轻工业和有关人民生活的日用品生产、能源、交通的建设，以及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事业，还要尽可能地继续发展。因此，实行进一步调整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方针，有退有进，暂时的局部的后退是为了将来更好的长期的稳定的前进。实行这样的调整当然要修改去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国民经济年度计划和今年的预算。这方面的问题，国务院将向人大常委会作正式报告。

实行这样的调整，不但从当前来说是完全必要的，从更深刻的意义上来说，也是要使我们的经济工作从根本上摆脱“左”的一套的束缚，真正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是10亿人口、8亿农民的发展中国家，我们是在这样一个国家中进行建设的。我们必须对这个基本的国情有清醒的认识。过去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老是犯“左”的错误，问题就出在没有认真研究中国的国情，犯了急性病，以至欲速而不达。现在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指导思想，必须统一到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按经济规律和其他客观规律办事这一点上来。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水平低的大国搞建设，不能急于求成，不能指望一下就出现什么奇迹，只能量力而行，脚踏实地，循序前进。我们仍然要坚持“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精神，进行长期的、艰苦的努力。

实事求是地把国情讲清楚，可以使人民理解我们的方针，体谅国家的困难，增强前进的信心。过去，我们对自己的国情认识得不够，考虑得不够，也宣传得不够。如果对于经济发展的前途随便说话，随便许愿，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计划，虽然是出于对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热望，但是不能兑现，就必然要引起群众埋怨和失望的情绪。今后，要把国家的实际情况、实际能力、实际困难以及经过努力所能达到的目标向干部、群众说清楚，办一切事情，提一切要求，都不能脱离现实的可能。这样，大家的认识比较一致了，很多误解和矛盾就比较容易消除，实际工作中的曲折也会减少，我们的事情也就会容易办一些，我们的日子不但不会更难过，而且可以好过一些。

这次调整，牵动全局，影响到各个方面，必然会有很多实际问题和思想问题。其中有些是我们已经能预见到的，也有些是现在还预料不到的。妥善地解决这些实际问题和思想问题，保证经济调整顺利进行，是一个很艰巨很复杂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进行广泛、深入、细致的组织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我们要切实有效地教育全党和全体人民认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极端重要性。要教育党员和干部坚决贯彻执行三中全会以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要教育全党同志紧紧依靠群众，与群众同甘共苦，带头遵守纪律，发愤图强，坚决纠正各种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要教育群众以大局为重，坚决维护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严格遵守法律和纪律，坚决反对只能葬送我们前途的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应该向全党和全国人民着重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科学文化，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没有这种精神文明，没有共产主义理想，没有共产主义道德，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同志说过，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我们一定要发扬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坚持的革命和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个人服从组织、局部服从整体，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的精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从延安到新中国，我们靠正确的政治方向，也靠这些崇高的革命精神吸引了全国人民和全国青年。我们一定要宣传、恢复和发扬延安精神、解放初期的创业精神。每个共产党员不仅自己必须首先保持和发扬这种精神，而且要把这种精神推广到全体人民和全体青少年中去。全国各族人民在党中央正确路线的领导下，振奋起勤俭建国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是一种不可估量的伟大力量。

新中国成立31年来，我们确实犯过不少错误，包括严重的错误，其间几经折腾，使人民受到了不少损失，也延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但是，经过31年的努力，我们建成了约40万个工业交通企业，工业固定资产比解放初期增加了二十几倍，培养了大批熟练工人和上千万专业人才，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全国人民的生活比解放前好多了。现在，党和政府着重检查了过去的缺点、错误，正确地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使我们整个建设的部署，安排在切实可靠的基础上。可以说，从现在起，我们才真正摆脱了“左”的思想的束缚，走上了健康的发展道路。只要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地努力前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调整经济，实现“四化”，这是历史交付给我们的重任。这副担子，不是哪几个领导人能够担得起来的，也不是哪一级组织能够担得起来的，需要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来承担。我们都是国家的主人翁，都要肩负起自己的责任，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同心同德，团结一致向前看。我们建设

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一定能实现。

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新年茶话会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主持了茶话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茶话会上就国民经济调整问题讲了话。

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邓小平、李先念、彭真、邓颖超等，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负责人和各界知名人士100多人出席了茶话会。他们分别围坐在小圆桌旁，促膝交谈，会场上洋溢着团结欢乐的气氛。

在茶话会上，胡耀邦首先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致以热烈的新年祝贺。他说，在迎接新的一年到来的时候，祝同我们党一道长期共同奋斗的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愉快。他说，党中央最近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了国民经济形势问题。他请赵紫阳向大家作介绍。胡耀邦说，今天招待大家的只有清茶一杯。古人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嘛。

接着，赵紫阳讲话。他指出，当前国民经济形势是好的，国民经济调整的方针是积极的，已经取得了成绩，在1981年要做进一步的调整。他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为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搞好国民经济调整作出自己的贡献。

茶话会上，大家畅所欲言，为搞好祖国的建设事业提出自己的建议。大家满怀信心地表示，形势一定会越来越好，一定要同心协力，为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而共同奋斗。

出席今天茶话会的有：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政协全国委员会负责同志王震、韦国清、乌兰夫、方毅、余秋里、张廷发、耿飚、倪志福、彭冲、陈慕华、赛福鼎、万里、谷牧、宋任穷、杨得志、胡乔木、姚依林、谭震林、廖承志、阿沛·阿旺晋美、许德珩、胡厥文、萧劲光、朱蕴山、史良、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薄一波、姬鹏飞、杨静仁、黄华、江华、黄火青、杨勇、王平、刘澜涛、陆定一、李维汉、康克清、季方、王首道、周建人、庄希泉、胡子昂、荣毅仁、王昆仑、何长工、程子华、杨秀峰、周培源、钱昌照；

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北京市的负责人以及各界知名人士屈武、朱学范、李世璋、郑洞国、甘祠森、吴茂荪、贾亦斌、楚图南、萨空了、李文宜、费孝通、高天、许涤新、孙起孟、孙晓村、周士观、浦洁修、黄凉尘、徐伯昕、雷洁琼、葛志成、沈其震、严信民、徐彬如、方荣欣、黄鼎臣、伍禅、邝明、茅以升、严济慈、金善宝、孙承佩、蔡啸、李纯青、苏子蘅、田富达、徐萌山、吴雪之、胡子婴、古耕虞、刘念智、赵忠尧、郭增恺、董其武、缪云台、顾大椿、韩英、高占祥、罗琼、周扬、夏衍、裴丽生、钱学森、杨显乐、张维、钱三强、王顺桐、曹靖华、姚雪垠、臧克家、谢添、张光斗、季羡林、宋子玉、梁焯辉、王义润、吴阶平、林乎加。

全国各省区市实行统一的标准排列顺序

经国务院批准，全国统一的省、市、自治区标准排列顺序从今日起实行。新的顺序是：1. 北京市；2. 天津市；3. 河北省；4. 山西省；5. 内蒙古自治区；6. 辽宁省；7. 吉林省；8. 黑龙江省；9. 上海市；10. 江苏省；11. 浙江省；12. 安徽省；13. 福建省；14. 江西省；15. 山东省；16. 河南省；17. 湖北省；18. 湖南省；19. 广东省；20. 广西壮族自治区；21. 四川省；22. 贵州省；23. 云南省；24. 西藏自治区；25. 陕西省；26. 甘肃省；27. 青海省；28. 宁夏回族自治区；29.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30. 台湾省。

实行全国统一的省、市、自治区标准排列顺序，是为了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的需要。行政区划排列顺序的标准化，将有利于计划管理、行政管理、统计汇总和人口普查，并为统一编码、收集整理资料以及建立数据库和广泛应用电子计算机方面创造有利条件。

全国人民在1980年为台湾回归祖国做了大量工作

据《人民日报》报道：1980年以来，全国人民为推进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做了大量工作。

在这一年里，全国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举行了各种形式的报告会、座谈会、联欢会。与会人士畅谈对台湾归回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心愿，抒发对台湾同胞的怀念之情。一些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负责人还撰写文章或发表讲话，希望台湾当局审时度势，消除疑虑，顺应历史潮流，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朝着祖国统一的伟大目标不断前进。呼吁双方建立联系，增加接触，为实现祖国统一共同努力。

报刊、杂志、广播、电视等报道了台湾同胞在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取得的一些新成果，以及他们面临的问题和对大陆家乡亲人的怀念。对台湾同胞要求民主、要求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正义斗争，给予了热情支持。出版部门陆续出版发行了一批台湾题材的书籍，其中《台湾小说选》《台湾散文选》《台湾诗选》是直接从台湾出版的书籍和杂志上选编的。这是30年来，大陆第一次把台湾文艺作品介绍给广大读者。去年8月5日，中国作家协会、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总部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举行座谈会，纪念台湾著名作家钟理和逝世20周年。一位到会的台湾同胞在发言中说，某些台湾作家的作品受到大陆同胞如此重视，充分反映了祖国大陆人民对台湾同胞的骨肉深情。

一年来，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各省，又新建了一批接待台湾渔民的接待站，接待了许多海上遇难的台湾渔民兄弟，为他们修船补网，补充食品、淡水。有些台湾渔民还在当地政府安排下参观游览了名胜古迹，会见了在大陆的亲人。各地人民政府还接待安置了一些从台湾辗转归来的台湾同胞，他们当中有年近八十的老人，也有二、三十岁的青年；有的单身一人，也有的是全家定居。现在，他们当中有的人在安度晚年，有的人投身到祖国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中。

为了使大陆与台湾之间尽早实现通商、通邮、通航，各有关部门进一步制定了一些具体政策，采取了许多有力措施。去年4月，我海关总署发言人宣布，为了便于祖国大陆与台湾之间通商，海关给予各种方便，并规定对台湾产品不征收进口关税。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福州等地的一些商店里，开始出售标明“产地：台湾”的商品。其中有电视机、电风扇、录音机、手表等。

一年来，台湾同胞和大陆人民一样，对实现台湾归回祖国，完成统一大业越来越关心。据台湾报纸报道，和平统一祖国问题，已经成为人们的热门话题，许多有识之士，不仅在私下谈论，而且在社会上、报刊上公开阐述实现祖国统一的意义，探索实现统一的途径，敦促台湾当局要从国家前途和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来考虑中国的统一问题。

此外，大陆的科学家、文学家、教育家、科技人员和运动员、海员等各界人士，一年来，同台湾的有关人士，交往越来越多，相互交流了情况，增进了感情，加强了统一祖国的愿望。

民盟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

会议于1月1日至15日召开。参加会议的各省、市、自治区民盟组织的负责人，学习了中共中央文件和《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明确了目前的形势和实现国民经济调整的巨大任务。在总结工作和交流为“四化”服务经验的基础上，会议讨论了民盟当前工作中的一些主要问题，并对今年民盟的工作交换了意见。

中国民主同盟的多数成员是文教科技界的知识分子。去年，各级盟组织紧紧围绕为“四化”建设服务这一中心，进行了组织整顿和建设，组织盟员在教育工作等方面献计献策，协助党组织落实政策，开展与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台湾同胞联系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据不完全统计，盟员中有1334人被评为各级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

民盟中央主席史良出席了会议。

1980年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工作成果发布

据《人民日报》报道：我国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工作，1980年又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和显著的效果。

1979年全国扩大自主权的试点企业为4000多个，1980年发展到6000多个。其中的191个企业，还先后开始了“以税代利、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试点工作。这6000多个试点企业，占国家预算内的42000个工业企业的16%，它们的产值约占60%，利润约占70%。

企业扩大自主权后，经济效果都比较好。据5422个试点企业初步统计，1980年1月至9月工业产值比1979年同期增长12%，利润总额增长17%，上交利润增长13%。扩权企业的产值和利润增长水平，一般都高于未扩权的企业。北京市经委和财税局预计，1980年北京市工业交通企业的利润可比1979年增长近5%，上交利润增长近2%；而其中的342个扩权试点企业，利润可比1979年增长9%，上交利润增长4%，超额完成全年计划。

四川省5个自负盈亏的试点企业，经济效果更为显著。1980年1月至9月工业产值比试点前的1979年同期增长45%，利润增长80%，上交利润增长46%。

1979年以来，有些试点企业生产任务不足，一些产品分配不出去。但企业由于有了自主权，就不再躺在国家身上吃“大锅饭”了，而是主动承揽任务，主动找原料材料，主动销售产品，结果不仅没有亏损，还普遍获得增产和盈余。职工群众说，扩权以后，企业内有动力，外有压力，充满着活力。

扩大自主权后，也使企业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有能力逐步改善职工的生活福利。

我国的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方向正确，步子稳妥，效果显著。对于存在的问题，要分析原因，总结经验，采取措施，加以解决，使已经扩大自主权的企业得到巩固提高，进一步发展这项改革的成果。要正确处理改革与国民经济调整的关系，使改革有利于调整。

1980年全国原油产量达1亿吨以上

据《人民日报》报道：石油工业部初步统计，1980年全国原油产量达到10580万吨，天然气产量达到137亿立方米，都完成了全年国家计划。原油加工也完成了国家计划，汽油、煤油、柴油、润滑油、化工轻质油等的总产量比去年增长1%以上，其中发展轻工业所需的化工轻质油产量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煤炭部发布数据表明全国累计探明煤炭储量6418亿吨

中国轻工业机械总公司在北京成立

经国务院批准，中国轻工业机械总公司在北京成

立。这个公司是按照专业化原则组织起来的全国性的经济联合企业。它把分布在全国各地的35个重点轻工机械企业、衡器企业和6个设计研究所作为直属企业和单位，同时对全国轻工机械和衡器行业的生产和建设实行归口管理，并组织行业内外的分工协作。

上海市标准计量管理局研制的氢原子钟通过国家鉴定

据《人民日报》报道：上海市标准计量管理局研制的能在60万年里时间误差不超过1秒的氢原子钟最近通过了国家鉴定。

氢原子钟是利用氢原子跃迁时辐射的电磁波控制的同步电钟，由于这种电磁波频率异常稳定，因而获得准确度极高的时间标准。目前国外最先进的氢原子钟每昼夜变化只有十亿分之一秒，用它来测量100多万年的整个人类历史，误差也只有0.3秒。所以，它在射电天文、宇宙通讯、火箭导弹的发射等方面都得到广泛应用。

《作品与争鸣》创刊

一家独特的文学刊物——《作品与争鸣》出版问世。这个刊物专门转载有争议的当代文学作品并围绕这些作品展开争论。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主编，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1月2日

福建省政协在福州举行座谈会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两周年

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两周年前夕，福建省政协在福州华侨大厦举行纪念座谈会。福建省各界人士及台湾籍同胞、去台人员亲属有100多人出席。会上大家热情赞扬了两年来海内外爱国同胞为促进祖国统一所作的贡献，并呼吁台湾当局顺应历史潮流，接受和谈建议并尽快实现海峡两岸之间的直接往来。

省政协副主席、中共福建省委统战部部长袁改首先在会上发言。他说，《告台湾同胞书》提出的解决台湾问题的大政方针，是我国政府从民族大义出发经过深思熟虑的，决不会轻易变动的。这是对海峡两岸都有利的大事。希望台湾当局能及时认清形势、顺从民心、解除顾虑，使海峡两岸能尽快实现直接往来，为祖国早日统一作出贡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政协副主席、福建工商联主任委员陈希仲，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福建民革主任委员傅柏翠、台盟福建支部负责人黄文浮等10多位各界人士、台胞、去台人员亲属代表也在会上发了言。

国家统计局发布1979年农村社员家庭经济情况调查数据

“根据23个省、区、市对408个县、10282户农村社员家庭的调查，1979年农村社员各项收入都有增加，家庭副业得到发展，但还有一部分社员收入水平仍然很低。”这是国家统计局在一项调查材料中提出的看法。

1979年平均每人总收入为179.8元，比上年增加29.2元；纯收入为160.2元，比上年增加26.6元

下面是国家统计局1979年对10282户社员家庭调查材料的摘要：这10282户社员，共有人口58153人，平均每户5.66人；劳动力24471个，平均每个劳动力负担2.38人（包括本人在内，下同）。平均每人拥有自营地0.18亩，其中自留地0.15亩。

1979年平均每人总收入为179.8元，比上年增加29.2元，扣除家庭副业的生产费用和纳税后，平均每人纯收入为160.2元，比上年增加26.6元，提高19.9%。

在纯收入中，来自集体的收入为102元，比上年增加13元，提高14.6%；来自家庭副业的收入为44元，比上年增加8.9元，提高25.3%；其他收入由9.6元增加到14.2元，提高48.7%。社员家庭副业和其他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由33.4%上升到36.4%；从集体得到的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由66.6%下降为63.6%。这反映了家庭副业发展较快的趋势。

这10282户，1979年平均每人家庭副业纯收入达44元，比上年增加8.9元。这是近几年来增长最快最多的一年。

在家庭副业中，除采集渔猎收入略有减少外，其他各项收入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由于社员家庭饲养业迅速发展，从而提供了大量畜禽产品，对活跃市场，增加社员收入，改善人民生活，都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从社员种植自营地的情况看，经济作物的增长快于粮食作物的增长。

保护所有权与自主权，实行生产责任制，鼓励社员经营家庭副业，提高农副产品价格，使社员收入增加

社员各项收入普遍增加的主要原因是落实了各项农村经济政策。首先，保护公社、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与自主权，实行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推动了集体经济的发展，使每一个社员从集体得到的粮食和现金比上年分别增加36.9斤和7.1元，即提高9%和27.3%。其次，社员经营自留地、自留畜和参加农村集市贸易得到了鼓励和扶植。最后，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有利于鼓励社员积极地发展商品生产，增加收益。

平均每人纯收入在80元以下的户占10%，其中纯收入不到60元的户占3.7%

值得注意的是，还有部分社员的收入水平仍然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低。在10282户中，平均每人纯收入在80元以下的户占10%，其中，每人纯收入不到60元的户占3.7%。

这些社员户收入低的主要原因是：集体生产没有搞好，因此社员从集体分得的收入少。家庭副业搞得不好。劳动力少，赡养人口多。平均每人纯收入60元以下的户，平均每个劳动力赡养2.74人；而每人纯收入250元以上的户，平均每个劳动力只赡养1.9人。

全国第一届电子科普积极分子大会在北京召开

出席第一届全国电子科普积极分子大会的100多名代表，就如何围绕“四化”建设大力普及电子科学知识，推广应用电子技术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大会还奖励了8个先进集体、30名积极分子，5本优秀科普书籍，5部科普电影。另外，有6人受到表扬。

中国木偶皮影艺术学会在北京成立

据《人民日报》报道：中国木偶皮影艺术学会最近在北京成立。这是我国木偶皮影艺术工作者的一件喜事。

我国的木偶皮影艺术历史悠久，品种繁多，扎根城乡，驰名中外，深为广大群众特别是少年儿童所喜爱。目前，全国已有20多个省、市、自治区拥有木偶皮影艺术剧团，专业和业余的木偶皮影艺术工作者已达10万人。

中宣部、文化部、团中央、全国妇联等单位的负责人周扬、贺敬之、周巍峙、林默涵、曹禺、高占祥、张淑义等出席成立大会表示祝贺。周巍峙、林默涵在讲话中指出，木偶皮影艺术拥有广大的观众，尤其是农村观众和少年儿童观众。对这种艺术，我们过去重视不够，今后各级文化部门要引起重视，加强领导，在经济上给以必要的支持。

出席会议的木偶皮影艺术工作者深感责任重大，决心为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提高少年儿童的道德修养、知识水平作出努力。会上选出了虞哲光为学会会长，何德润、杨烽等为副会长。

中国摄影家协会在北京举行1980年摄影理论年会

据《人民日报》报道：这是我国摄影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理论会议，与会代表着重讨论了摄影艺术的特性和功能，新闻摄影和艺术摄影的关系等议题。

大家认为当前应注重研究摄影艺术的特性，才能提高摄影在艺术园地中的独立地位。

由吴海林 李延沛编纂的《中国历史人物辞典》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中国历史人物辞典》共收词目13000余条。对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作家、艺术家、科学家、人民起义领袖、少数民族重要人物，以及帝王将相、学者名流、能工巧匠等5800余人分列条目，按其生年先后为序，备载他们的生平、著述、爱好，并简述其在历史上的地位。本书文字简明扼要，不作繁琐考证，不偏信轶闻传说，而以史实为依据。它所收录的历史人物，起自商汤，止于清。近代、现代历史人物，他们另编有《中国历史人物辞典·续编》，承接上编至20世纪70年代末，共收录1200余人，约40万字。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杂志创刊

该杂志（双月刊）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主要探讨国内外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刊登政治经济学、部门经济学和经济管理方面的文章，也刊登经济调查、国内外经济理论评介的文章和资料。

1月3日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科学的方法和方法论的科学》

办任何事情，有了适当的科学方法，就比较顺利。毛泽东同志曾把科学方法比作过河用的船和桥。科学方法的问题，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显得格外突出、格外重要。因为，现代化建设实际上是一个庞大的多层次的结构，层次与层次之间及各层次内部存在着错综复杂的联系。我们进行某一项工程建设，某一种制度、体制的改革，都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运用科学方法，考虑到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才能得到最佳方案，最经济的效果。武钢一米七轧机因电力供应不足而影响开工；宝钢工程中对原料供应、料场地质等问题未作可行性分析，造成资财大量浪费，就是证明。

种田，同样要注意科学方法。我国的农业正处在传统的耕耘业向现代化过渡时期。我们既不能囿于传统农业的狭隘眼光组织生产，又不能忽视自然条件、经济因素和生产水平的差异，不严格遵守“一切经过试验”等科学方法，照抄照搬世界最先进的农业技术，那样做，必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

人事工作方面有没有运用科学方法的问题呢？有。一个单位各部门人员怎样构成，比例如何安排，都需要运用科学方法进行比较精确的测算。人是宝贵的因素，但并非人员越多越好，一个单位人员编制分配不均衡，结构不合理，就会造成忙闲不均，人浮于事，用非所学。

至于科学方法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更是自不待言了。但是，并非搞科学研究的人都懂得科学方法。在科技界，现在还不断出现这类现象：有的人好高骛

远，赶时髦，在利用杂交优势“大方向正确”的幌子下，设想研究什么竹子与水稻杂交，实在是异想天开，贻笑大方；有的人不做扎实严密的工作，不做起码的对照实验，不在同一个基础上进行实验对比，就宣称自己得到重大的突破性的成果。这些在科学方法上都是站不住脚的，因而这类科学研究也是没有科学价值的。

科学方法论是自然辩证法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既然科学方法那么重要，自然辩证法就应受到高度重视了。事实并非如此，一些人甚至一听到这个名词就反感。这是为什么？除了科学知识水平低之外，还因为以往在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的研究、运用、普及、宣传中，存在着一些违反科学方法的问题。有的同志把这些问题概括为四个字：空、古、棍、贴。

“空”，是指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不是从具体的科学研究、生产技术的实际出发，对一些自然科学研究方法进行理论概括，而是搬一些概念，大概念套小概念，甲概念解释乙概念，空空洞洞，脱离实际，使自然辩证法变成僵化的教条。

“古”，由于不从科学研究实际出发，只能找过去一些经典书上提到的科学史的例子作为证据，较多的是外国科技史上的例子，同我国当代的科学实际、经济建设实际相差甚远，令人乏味。

“棍”，是指打棍子。自然辩证法、科学方法本来是科学研究的工具，指导、推动科技工作者去开拓新的领域，探索新的道路。但一个时期以来，它却变成了打棍子、扣帽子的法宝。这种流毒并没有肃清。

“贴”是贴标签。往往是用经典作家、革命领袖的话套到某些科研新成果、经济新成就上去，牵强附会、生拉硬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简单化、庸俗化。明明某项成果产生于领袖某个讲话之前，非要说这项成果是在领袖这个讲话指导下产生的，弄虚作假，自欺欺人，实际上为建造现代迷信大厦添砖加瓦。

凡此种种，都使自然辩证法、科学方法论不能发挥应有的效用。当然，自然辩证法宣传、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不能否定它本身的使用，正确地研究、宣传、运用自然辩证法、科学方法论，将此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桥梁，使之在国民经济建设和科学研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一重大的历史任务自然地落到了结成联盟的广大自然辩证法工作者、科技工作者和科技管理干部身上。

国务院采纳建设银行北京前门支行的合理建议决定停建北京地铁大修厂

据《人民日报》报道：国务院机械委员会最近采纳了建设银行北京前门支行的合理建议，决定停建北京地铁车辆设备修理厂（简称地铁大修厂），为国家节约投资2000多万元，节省人员800多名，节约建设用地300多亩。

地铁大修厂是在1975年经国家计委批准修建的。设计总投资为2007万元，近期建筑面积达57306平方米，占地387亩，定员1000多人。1978年列入基建大中型项目计划，并在北京清河动工兴建。

这个厂该不该建是早有争议的。北京前门支行经过反复调查研究，发现这个厂的主要建设内容与951厂（原为北京工程机械修配厂）基本相同。北京前门支行积极发挥监督作用，从1978年起曾多次向上级有关部门提出停建地铁大修厂，改建、扩建951厂的建议，经过多方努力，这项建议终于被采纳，避免了重复建设。

国家统计局发布1980年全国轻重工业比例数据

随着国民经济调整方针的贯彻，我国轻重工业的比例关系逐步得到改善。据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1980年，我国轻工业生产比1979年增长16%左右，而重工业增长2%左右。由于轻工业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重工业，轻工业在整个工业中的比重已上升到46%以上，比调整以前的1978年提高了近4%，比1979年提高了3%。

轻重工业比例关系是否协调是国民经济结构是否合理的重要标志之一。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轻重工业的比例保持在53∶47的水平，情况比较好。在那以后由于经济工作中“左”倾思想的影响，50年代后期轻重工业比例开始失调，到1960年，轻工业在工业经济中的比重就下降到33.3%。经过60年代的调整，到1965年回升到50.4%。在十年动乱期间，轻重工业比例关系又遭到严重破坏，从1966年到1978年间，轻工业在工业经济中的比例多数年份在43%左右徘徊。

1979年，根据中央提出的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调整轻重工业的比例关系，加快轻工业发展。从1979年下半年开始，出现了轻工业增长速度持续超过重工业的新形势。去年年初，国家进一步制定并贯彻了对轻纺工业实行“六个优先”的措施。去年，国家为轻工、纺织、电子工业部门提供的贷款达20亿元。各省、市、自治区也拨出了较多的地方财力扶持轻工业，在原材料、电力、运输的安排上，都给予优先保证。因此，去年一年，轻工企业生产增长迅速，产品质量提高，品种增多，适销对路。纺织、轻工、电子、医药等工业部门的生产都获得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人民生活急需的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化学纤维、毛线、电视机、录音机、收音机、照相机、袖珍电子计算器等产品比1979年分别增产3成至

3倍。

在加快轻工业发展的同时，国家和地方对重工业生产进行了调整，利用调整出来的技术力量、厂房、设备，转产市场需要的轻工产品，有些重工企业还同轻工企业开展多种形式的经济联合，发展轻工业生产。

为了扶持轻工业发展，冶金、机械、化工等重工业部门还进一步调整产品结构，更好地为轻工业生产服务。去年，冶金部门生产的小型钢材、线材、薄钢板、带钢、焊接钢管等短线钢材产量比1979年增长了42.2%。

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黄华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参议院共和党副领袖西奥多·史蒂文斯和美国共和党全国少数民族委员会主席陈香梅

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黄华电贺加斯东·托恩就任欧洲共同体委员会主席

1月4日

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参议院共和党副领袖西奥多·史蒂文斯和夫人及美国共和党全国少数民族委员会主席陈香梅

会见时，邓小平阐述中国政府关于发展中美关系的正式的原则立场，批评在美国报刊和一些人中存在的可能导致中美关系后退的观点，特别强调了台湾问题的重要性。邓小平以荷兰一公司为台湾制造两艘潜艇一事为例，指出：如果荷兰不改变这个决定，中国同荷兰的关系肯定要倒退。邓小平希望在中美之间不要出现类似的事情。他说，这个问题是以后能否继续发展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以及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的焦点。

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大江截流胜利合龙

19时53分，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建设者们从戗堤两岸抛投最后一车石料，大江截流胜利完成。整个工程设计装机容量271.5万千瓦。3个船闸的年单向通过能力可达到5000万吨。葛洲坝能够升高长江上游水位20多米，回水120—200公里，可以大大改善艰险的三峡航道。

中共中央 国务院电贺葛洲坝大江截流工程胜利合龙

葛洲坝工程局、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以及参加工程建设的全体同志：

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关键项目大江截流于1月4日胜利合龙，这是在中共湖北省委、省人民政府、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以及全国的大力支持配合下，勘测、设计、施工、科研和设备制造工厂密切协作的胜利成果。特向参加工程建设的各级领导、全体科技人员、干部、工人、民工和家属致以热烈祝贺和亲切慰问，并希再接再厉，继续奋进，确保今年安全度汛和通航发电。

中共中央 国务院

1981年1月4日

20个省区市采取措施推动企事业单位治理污染

据《人民日报》报道：为了推动工矿企业和事业单位积极治理污染，我国20个省、市、自治区1980年根据国家《环境保护法(试行)》的有关条款，对超过国家规定标准排放污染物的1500多个企业、事业单位征收排污费。

这20个省、市、自治区是江苏、云南、河北、浙江、湖南、湖北、安徽、陕西、甘肃、河南、山西、山东、贵州、江西、福建、广东、辽宁、四川、上海、新疆。收取排污费的标准，一般略高于治理污染设施日常运行所需的费用，如果治理有效，不再排污，即停止收费；如有条件治理而不积极治理，则要逐年提高收费标准。

我国现有的工交企业和一些排放污染物的事业单位，绝大多数没有防治污染的设施。长期以来，许多单位任意排放污染物，危害环境而不承担任何经济责任，而有些企业建设了治理污染的设施，把运行费用摊入了产品成本，从而减少了利润。结果便出现了一种不合理现象：任意排放污染物的企业，成本低，利润高，被认为是先进单位；积极治理污染，保护环境的企业，成本高，利润低，受到主管部门的批评。这就严重地影响了企业治理污染的积极性。收取排污费后，初步纠正了这一偏向，推动了工厂企业治理污染。南京市被征收排污费的企业，半数以上现在都提出了治理污染的方案，有的单位已安装治理装置，投入使用。黄石市实行收费后的两个月内，长期超过国家标准排放污染物的24个企业，就有22个采取了治理措施，并取得了初步成效。

收取排污费，也为治理污染开辟了一条资金渠道。

国家科委和国家经委在北京召开会议向全国推广国产消气剂

会议于1月4日至9日召开，向全国推广国产消气剂，并准备进入国际市场。我国自行研制成功的电视显像管、日光灯和特种电子管用的4种消气剂，经严格的对比试验和各项参数的测定，证明其质量和性能赶上世界上最好的一家外国公司同类产品，现已形成一定的生产能力。

消气剂是影响电真空器件使用寿命、稳定性、可靠性的关键材料。它好比安装在电真空器件里的一台“化学真空泵”，能不断地吸收器件内部的零件在工作时放出的气体，从而保证其真空度。我国生产的电视显像管质量过去长期过不了关，原因之一就是消气剂性能差。

上海钢铁研究所从1974年起研究显像管用掺氮消气剂，经过几年的努力，到1978年基本掌握了该项技术。1979年6月通过了部级鉴定。而后，该所成批生产掺氮消气剂，不断提高产品质量，目前的年产量能满足100万只显像管生产的需要。他们的产品已在50万只黑白显像管上试用，加上制管技术的提高，管子寿命普遍从2000小时提高到8000小时。用该所消气剂装配的黑白显像管，在全国质量评比中，胜过用进口消气剂装的管子，连续两年被评为第一名。

有色金属研究总院从事锆铝消气剂和汞释放剂的研究，1975年开始投入工业性试生产，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目前，该院已能成批生产和供应这两种产品，质量又有进一步提高。他们的锆铝消气剂用在行波管、磁控管等特种电子管上，效果良好。汞释放剂在日光灯生产线上应用后，从根本上解决了汞污染问题，大受工厂及周围居民欢迎。用国产汞释放剂已装日光灯300多万支。

据专家和有关方面计算，只要在上述两个科研单位补充少量装备，增加很少投资，就能在短期内形成较大的生产能力，满足全国对上述3种消气剂的近期需要，并能组织出口。这3种国产消气剂是我国科研人员独立研究成功的，采用了新的冶炼工艺和新的原材料。原材料全部立足国内。

此外，北京电子管厂和有色金属研究总院还在最近研究成功特殊用途的锆石墨消气剂，性能同样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全国1980年新建小水电站4000多座

据《人民日报》报道：1980年全国新建小水电站4000多座，投产容量超过80万千瓦。截至1980年年底我国广大农村拥有小水电站共有9万座以上，总容量710多万千瓦。

去年年初，水利部同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联合召开了全国小水电会议，会后各地普遍加强了对小水电的建设和管理的领导，广东、湖南、四川、福建、浙江、江西等省新增投产容量较多。如广东省增加13万千瓦，全省小水电总容量累计达到100万千瓦，占全国总容量的1/7，是目前我国小水电最多的一个省；黑龙江和河北省也比上一年有较大幅度的增长。据统计，1980年全国小水电年发电量达到120亿度以上，相当于节省600万吨的标准煤。

八盘峡水电站全部建成

据《人民日报》报道：黄河上游八盘峡水电站最近又有两台水轮发电机组正式交付使用。至此，这座装机总容量为18万千瓦的中型水电站全部建成。

这座水电站位于兰州市境内，共安装5台转桨式水轮发电机组，其中有3台是从瑞典引进的，2台是国内制造的，都已并入兰州电网发电。

全国最大的超高压工频试验变压器在辽宁沈阳试制成功

据《人民日报》报道：759000千伏安培的超高压工频试验变压器，最近在沈阳变压器厂试制成功。这台大型变压器适用于超高压输变电线路和超高压电器设备试验，经过全面试验，全部达到设计水平。

李心意 胡娜在墨西哥城举行的第三届世界“白宫杯”青少年网球赛中获女子双打冠军

龙许逝世

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管理局顾问、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龙许同志，因病于1月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0岁。

龙许1928年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转为中共正式党员。龙许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红二方面军党支部书记、指导员，陕西省云阳蟠龙残废军人医院副院长、院长，军委供给部副处长，中央工委供给部处长、副部长，中直文化学校副校长，中直管理局处长、副局长，中央办公厅管理局局长等职。

1月5日

《人民日报》摘要转载1980年12月30日《新华日报》评论员文章《同一切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作斗争》

文章说：国家的财政收入，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国家制定的财经纪律和财税政策、法令及制度规定，体现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是国家及时地、稳定地、可靠地组织财政收入的重要依据和保证。要自觉地维护财政制度法令的统一性和严肃性，把应当收缴的税利，及时、足额地上缴国库，以保证国家全局的资金需要。实践证明，能否确保国家财政收入，实现财政收支平衡，是一个关系到能否实现经济稳定和安定团结的重大政治问题，是一个关系到国民经济全局的问题。因此，在当前特别要强调树立全局观

点，加强法制观念。要严格执行财经纪律，按照国家现行的政策法令和规定办事。对现行财政管理体制和财税政策、法令有意见或建议，应向上级政府报告，由国家授权机关审议。切不可自立章法，各行其是！

《人民日报》摘要转载《光明日报》左春台的文章《经济建设要循序前进——从60年代调整工作谈起》

据说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可以直译为“回忆往事的运动”。我想，把60年代三年调整时期的工作回忆一下，这将有助于提高我们对当前国民经济调整的迫切性和重要性的认识，也可以增强我们对通过调整以减少以至消灭赤字、稳定经济的信心。下面，我说一说自己的几点感受。

第一点，想要快，反而慢

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封锁禁运等困难情况下，还是完成得很好的。当时，我们资金有限，没有经验，而且搞社会主义只有苏联一个模式，所以，在许多问题（不是一切问题）上我们照搬了苏联的经验，这在当时是不可避免的。从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我们曾想突破苏联的框框，闯出一条路来，搞得更快一些。这个想法是对的，无可厚非，问题在于许多事情做过了头。1958年后半年提出1070万吨钢，翻一番；接着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搞“一平二调”，刮“共产风”“浮夸风”；财政银行打破框框，搞什么无账会计，挪用商店的商品搞基本建设，挪用银行的流动资金搞基本建设，还有赊销预付等。当时有一句话，叫“方向对头，不怕杀头”，规章制度可以不要了。谁不想快呢？但是离开了当时的客观条件，反而慢了。我们来个“大跃进”，结果损失很大。1959年后半年，庐山会议之前，本来问题已经察觉了，庐山会议开始，也想纠“左”。由于错批了彭德怀同志，由纠“左”变成反右，这个“大跃进”又延续了一段时间，使我们受到了更大的损失。直到1961年的1月，党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才开始调整。到1962年，经济形势开始好转；到1963年，比例失调的情况已经基本调整过来；1964年和1965年，我们经济的发展就比较好了。所以，“大跃进”给我的第一点感受，就是主观想快，反而慢，欲速而不达。

我想，30年来，我国经济所以发展慢，就是因为我们想快；当我们不怕慢的时候，我们反而可能快了，或者说，当我们把比例关系安排好的时候，不想快也由不得个人了。当然，这个说法不那么全面，经济发展慢，还有政治动乱的原因。但是，主观上想快，急躁冒进，确实是我们发展不快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根源。这个问题到现在是不是真正解决了，还很难说。比如，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国民经济面临崩溃边缘的情况下，还要大干快上。我从《三国演义》诸葛亮舌战群儒中抄了一段话。诸葛亮是这样说的：“譬如人染沉疴，当先用糜粥以饮之，和药以服之；待其腑脏调和，形体渐安，然后用肉食以补之，猛药以治之：则病根尽去，人得全生也。若不待气脉和缓，而投以猛药厚味，欲求保安，诚为难矣。”这段话说得多好，对我们多么合适！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明确提出调整是关键。八字方针的提出，标志着我们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的根本转变。

当然，我们说不怕慢，并不是说我们的工作可以慢慢腾腾去搞。而是说，在这个期间抓好调整，正是为了将来快；你现在不打好基础，就想快，结果是快不了。中国有句古话：“企者不立，跨者不行。”意思是说，脚尖立地不能持久，跳跃前进不能致远。认真接受欲速不达的教训，使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的指导思想在全党全体干部中扎根，我们国民经济发展就会快。这是我感受最深的第一点。

第二点，搞经济不那么容易

我们所以老犯主观上想快这个毛病，是同把经济工作看得太容易有关，同忽视经济工作与军事、行政和一般政治工作有不同特点有关。列宁曾经讲过经济工作不同于军事、行政和一般政治工作的特点，即：经济工作更困难、更缓慢、更要循序渐进。（参阅《列宁选集》第4卷，第560页）我们往往把列宁的这个指示忽视了。1958年提出把钢铁翻一番；粉碎“四人帮”以后，在经济建设方面提出了过高的目标，原因之一，就是把经济工作看得太容易了。

1962年，陈云同志有一次讲话，在讲到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时，我记得开了3张支票：一是分几步做到城市每人每月供应一些大豆，以补充营养；二是把全国各地的一部分山珍海味等高级副食品，用来扩大高价馆子；三是为了补充棉花的不足，也为了减少女同志补袜子的困难，每年供应几千万双尼龙袜子。结果是愿许得少，实际给得多，形势很好。小平同志讲，到本世纪末，我们只能达到小康之家。他们是把经济工作看得复杂、困难、不那么容易的。办经济没那么容易，比如说，给城市的1亿多人口每人增加1平方米住宅，就很不容易！就是把房子盖起来了，还有下水道、电灯、服务设施、交通等等。

当然，我们说经济工作不易，并不是说可以被困难吓倒。如果我们像列宁所说的那样，正确地认识和掌握了经济工作更困难、更缓慢、更要循序渐进这些特点，那么，承认困难就包含着克服困难的条件。相反，如果把经济工作看得那么简单容易，困难就会随之而来。事物的辩证法就是这样。

第三点，具体、具体、再具体些

我们所以往往把经济工作看得太容易，同一些同志好讲空话、不具体、不落实有直接的关系。搞经济要具体、具体、再具体些。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制定经济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是非常重要的，但一定要落实、要具体化。60年代的调整所以见效快，除了中央确定的方针政策正确以外，就是因为政策落实，抓得具体。我举一个小的例子，就说高价糖果。我记得陈云同志先问商业部有多少糖？除了保证每月每户2斤以外还剩多少？如何最有效地利用这部分糖？最后，陈云同志出主意卖高价糖果。账算清了，估计高价糖能敞开供应，就下了决心。后来又召开6个大区的财办主任会议，专门讨论高价糖果问题，从原料、生产、包装纸的供应，到高价分几等，那是很具体的。糖果生产出来以后，还试销一下，并派一些同志去看，去听反映。最后才敞开卖。多么具体啊！陈云同志又指出，高价糖果的利润是超额利润，除了正常利润外，用作回笼货币，财政部不要收这个钱，收了这个钱你又花了，又变成购买力了。这又是多么具体呀！所以，我说经济工作是具体的。目前，有许多问题看到了，也正确地提出来了，但是没有见效。为什么？就是不具体、不落实。比如，钢材和机电产品积压的问题，早就提出来了，但是，钢材库存老是增加，机电产品积压已达600多亿元。原因之一，就是积压的原因没弄清。谁来负责，不具体。基本建设战线长，这也不是说了一年了，但现在还是长，为什么？就是不具体。不仅不具体，还有不少名堂。压缩基本建设战线，结果是没压，变成“缩”了。预算内压了，缩到预算外去了；财政压了，缩到银行贷款那儿去了；国内压了，又缩到搞国外借款。缩而未压，最后变了戏法了。现在重复建设很多，我觉得计委向人代会报告基本建设投资的时候，应该有一个基本建设分布图。打仗要看军事地图，搞建设要看经济地图。这样，审查就具体化了，也就知道哪些是重复建设了。哲学家靠概念、推理和判断来说服人，文学家靠形象来说服人，我们财经工作要靠事实和数字来说服人。现在我们有许多财经论文是很好的，美中不足的是在提出问题时数据不足，缺少数字的计算。比如，说所得税如何如何好，但没说税率是多少。税收的核心是税率，不讲税率高低就说好，我多少有点怀疑，说服力就不那么大。

第四点，调整得早比晚好，狠比软好

1958年“大跃进”中的问题，在1959年下半年庐山会议的时候就发现了，假如庐山会议纠正“左”的倾向，及时进行调整，我们的损失会小得多。由于庐山会议反右倾，“跃进”又持续了一年多，到1961年才调整，我们加倍付出了代价。现在也是这样。假如我们从1979年中央提出八字方针以后，下决心调整的话，现在就会轻松一些，状况会好一些。由于我们没有执行好，到1981年我们还得用全力抓调整。从时间上来说，调整得早比晚好。从采取的办法来说，把困难估计得充分一些，手段采取得狠一些，比对困难估计不足，办法软要好。现在回过头来看，三年调整时期采取的措施是狠的，退够，抓狠，效果也很显著。最近，中央和国务院重申调整是关键，是中心，是全局，提出要退够。只要我们一步一步地狠抓下去，也会很快见效。

当前的调整和60年代的三年调整比较，有相同点，如：都是基本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都是由于各部门比例不协调引起的严重失调等。但还有一些不同点：

一是那次调整下的是小土群、小高炉，比较容易，放得下；这次下的大项目，像人们很形象地说是“大洋马”，不大好下，也舍不得下。

二是那次调整主要目标是调整，没有搞改革；这次既要搞调整，又要搞改革，调整是中心，但不是放弃改革，二者应该相辅相成。改革要有利于调整，有利于消灭财政赤字，有利于经济的稳定。有的改革甚至要抓得紧一点，搞得快一点。比如，配合调整很需要改革基本建设投资的管理办法，不改革，基本建设战线就缩短不了。像这种改革，就应该抓紧搞。有些同调整有矛盾，就要放慢，或者先搞一点试验。

三是那次调整，危险摆在明处，大家看得都很清楚，所以思想统一，步调一致，抓得很紧，见效也快。这次调整，危险是潜伏着的，人们看得不那么清楚。现在的国际条件和那时不一样，可以利用国际条件，市场情况比那时候好。那时是“一灶吃饭”，中央、地方休戚与共；这次是“分灶吃饭”，赤字在中央，地方不感到那么紧张。正因为如此，思想就不那么统一，步调就不那么一致。我们应该看到潜伏着的危险。

四是那次调整资金渠道比较简单，分工比较明确。财政、银行两个闸门一关，就管住了。现在资金渠道很多，财政以外有银行，银行以外还有企业，人民币贷款以外，还有外汇贷款等。这家关了，那儿又开了。还有，那次是下放2000万职工，这次是安排几千万待业青年就业。

总之，当前有好条件，也有困难。重要的是思想要统一，计划要控制，资金渠道要整顿，行政要干预。

全国外国经济专家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

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在会上说，在调整时期，在华工作的外国经济专家不会减少；而且随着补偿贸易和合资经营的发展和贷用世界银行和日本海外经济协力基金会资金建设的项目，外国经济专家还将有所增加。

谷牧说，我们目前的困难是暂时的。我国对外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开放的政策没有变。中国仍然是一个最大、最稳定的市场。

谷牧副总理说，我们搞“四化”建设，主要是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充分发挥我国的现有经济、技术力量的作用；但同时也要向外国学习，利用外国的资金，引进外国技术和设备。

近几年来，在外国经济专家的帮助下，我国建成了一批化工、纺织、电力、轻工、煤炭、冶金、民用机械等项目，还有一批项目也将建成投产。

姬鹏飞副总理在会上说，在华的外国经济专家，绝大多数是劳动者，在政治上应当把专家当作朋友，在技术上把他们当作老师，要主动团结，密切合作，虚心学习，用其所长，充分发挥专家的作用，为我“四化”建设服务，并增进中外人民之间的友谊。

他说，我们聘请外国经济专家，主要是使用他们的技术，顺利完成合同项目，向他们学得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培养建设人才。

在谈到生活接待方面时，姬鹏飞说，要考虑到外国专家是来帮助我们搞建设的，各地要保证对专家的住房和商品供应，提高服务质量，使他们在中国工作安心，生活愉快。

全国电力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会议于1月5日至19日举行。会议决定，要调整好电力工业内部的比例关系，搞好基本建设，同时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潜力，使电力工业更好地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服务。

会议决定，1981年要提高对送变电工程投资的比重，即由1980年的22.3%提高到28.1%。特别要加快50万伏超高压送变电工程的设计、施工和投产运行。华中电网的平顶山至武昌，东北电网的锦州至辽阳段的50万伏超高压线路，今年要建成。同时还要加快建设葛洲坝、淮南、谏壁、秦岭、白龙江、乌江渡等电厂的送电工程；石家庄至保定、大庆至哈尔滨、乌江至重庆等联网工程也要尽快完工。改变过去那种由于送电、变电工程建设跟不上发电厂的建设，有些电厂建成后电送不出去的现象。

为改变水电和火电建设比例失调的现象，在发电部分的投资中，水电建设的投资要由1980年的48%提高到50%。水力发电今年要重点建设华中电网的葛洲坝工程，在保证大坝安全度汛的基础上，要求今年有两台各17万千瓦的机组建成发电；川贵电网的乌江渡、东北电网的白山、西北电网的龙羊峡、安康等水电站都要抓紧施工，争取有一部分机组投入发电。同时，还要做好碧口、龚嘴、富春江3项水电工程的验收工作。

会议决定今年要加强基建前期工作。要求完成初步设计1020万千瓦，完成一批火电工程的选厂工作，进行河流规划18项，并作出主要电网的长远规划。

会议强调，在调整时期要把现有发电设备的安全生产、电能质量、设备完好率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做到城市和工矿企业重要用户电压合格。此外，还要千方百计节约煤炭消耗。

全国统计局长会议在北京闭幕

会议由国家统计局组织召开。会议着重研究了加强和改革统计工作的问题，安排了1981年的统计工作，讨论修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草案)》。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到会讲了话。

会议指出，今年我国国民经济要进一步进行调整。在新的形势下，统计部门要积极开展国民经济综合分析工作，对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和当前国民经济调整中的一些迫切问题，要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如实提出统计情报，以便国家加强对宏观经济的计划指导和行政干预。同时，要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建立起适应我国情况的国民经济平衡统计核算体系。

会议强调提高统计数字的准确性。各级统计部门都要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如实反映情况，坚决反对弄虚作假。各地区、各部检查国民经济执行情况，都应以统计部门的数字为准。任何人都无权任意修改统计数字。要切实加强基层统计工作，健全企业和农村人民公社的核算制度，把统计数字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

为了保证统计任务的完成，会议提出，必须健全统计机构，充实统计人员，建立强有力的统计系统。

要把地、市、县统计机构迅速恢复和健全起来。县以上各级政府统计部门的人员，要按照国务院1979年的有关决定，尽快恢复到1965年的实有人数。国务院各部门的统计机构要加强，人员要充实。各企业、事业单位也要配备同工作任务相适应的统计人员。

全国计量工作会议在北京闭幕

会议是由国家计量总局组织召开的。出席会议的代表们学习了中央关于进一步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方针的指示，一致认为，我国国民经济进一步认真实行调整，将使我们的经济工作从根本上摆脱“左”倾思想的束缚，真正贯彻量力而行的方针。计量部门的任务是运用计量科学手段提高生产、建设的经济效果，在这次调整中，必须从我国的实际出发，面向生产建设第一线，特别要加强厂矿企业的计量工作。

会议要求，各级计量部门要十分重视能源的计量测试管理工作。要协助有关部门调查企业能源计量测

试情况，研究建立能源计量标准，开展热平衡测试。

会议还要求计量部门配合工商行政、物价、商业、粮食等部门，在稳定物价工作中发挥积极作用。

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黄华在人民大会堂分别会见泰国新任驻华大使哥颂·信他瓦暖和伊朗新任驻华大使塔吉·法拉希

《郭沫若全集》编辑注释会议在福建厦门召开

1月6日

中办转发中央统战部等部门《关于抓紧对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落实政策工作的请示报告》

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 中组部《关于在国家机关安排党外人士担任领导职务的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

报告指出，应根据选拔干部的标准，经过群众路线，把那些有业务专长、有影响的党外专家选拔到适当的领导岗位上来。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铁公鸡——一毛不拔”好》

一份1981年日历封面上印着一只大公鸡，邮电部发行了“辛酉年”邮票，图案是名画家张仃画的一只引吭高歌的雄鸡，告诉人们农历鸡年到来了。在这鸡年，在实行经济大调整，压缩基本建设投资规模，节约行政、事业费用开支，消灭财政赤字的时候，应该提倡“铁公鸡”精神。

这里说的“铁公鸡”，当然不是指铁铸的公鸡，而是指我国民间流行的一句歇后语：“铁公鸡——一毛不拔！”人们常用这句话形容、批评某个人极端吝啬，连一文钱也不肯花。有时，只要你说“他是铁公鸡”，不讲“一毛不拔”四个字，听的人也就明白了。

用“一毛不拔”形容人的吝啬，大概是两千多年前孟轲老夫子的发明。当时，他批评一个哲学学派的头头杨朱是个极端为我主义者，说：“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见《孟子·尽心上》）后来，人们便用“一毛不拔”来嘲讽吝啬者。“铁公鸡”大概是从“一毛不拔”转化而来，是个明显的贬义词，意味着极端吝啬。今天，我们要调整国民经济，紧缩财政开支，把“铁公鸡”作为严格执行财经制度，厉行节约，紧缩开支的象征，用在为社会主义当家理财的干部身上，用在财政经济部门工作的同志身上，用在厂矿企业的领导干部身上，用在所有管钱管物的人员身上，不是很好吗？在我们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占绝对优势的国家里，为了保护国家财产，爱护公共财物，多么需要发扬“铁公鸡”精神啊！

在基本建设方面，多年来，形成了一种争投资，争物资的风气。争到手以后，却不问投资效果，不问使用好坏，不问创造财富多少。有的同志轻易定项目，包括某些引进的重大项目，随便批条子，仓促上马，造成很大浪费。在一些建筑工地上，砖瓦破碎，灰砂流失，机械设备风吹雨淋，人们见了十分痛心。在这方面，多么需要发扬一毛不拔的“铁公鸡”精神！

在厂矿企业里，有的破坏财经制度，巧立名目滥发奖金；有的浪费原材料，不合格、不适销的产品堆在仓库里；有的劳动用品随便滥发，请客吃饭也要公家报销。克服这些现象，多么需要发扬一毛不拔的“铁公鸡”精神！

在出国考察访问中，有些代表团、组行政人员多，技术人员少，结果收获很小。有的重复访问，一个单位索取同样资料，甚至国外没有相应的对口单位，也要到国外考察，名义上是考察，实质上是借机观光。解决这些问题，严格控制外汇使用，多么需要发扬一毛不拔的“铁公鸡”精神！

总之，大手大脚，把关不严的情况必须改变。不少同志以为我们国家大，多花一点钱，好比在大公鸡身上拔一根毛，算不得什么。殊不知，你拔，我拔，他也拔，见毛伸手抢着拔，用不了多久，羽毛丰满的大公鸡也会成为秃鸡的。有些同志自己身上掉根头发都感叹不已，拔根汗毛也怕痛，而对国家身上的毛、公家身上的毛却采取了异常“慷慨大方”的态度。当然，在我们经济战线上，坚持原则、遵守制度者大有人在。他们铁面无私，对国家、集体的财物把关很严，不随便开支一分钱，可以说是“一毛不拔”以利天下，特别是建设银行的许多同志为国家把口子，节约不少投资，这种精神值得大家学习。

当然，“一毛不拔”是极而言之，该花的钱还是要花，但也要用得合理，尽量节省。所有为国家为集体管钱管物的人，一定要发扬“铁公鸡”精神，坚决做到“一毛不拔”。对此，即使有人指责我们吝啬，也该心安理得。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讨论会在辽宁沈阳举行

讨论会于1月6日至14日举行。

与会同志分析了我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工作的经验教训，探讨了发挥地区优势和全国综合平衡的关系等问题，认为地区优势的发挥应该收到提高全社会生产的经济效果。

这次经济理论问题讨论会是由国家计委经济研究

所、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辽宁省计委经济研究所联合发起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有许涤新、薛暮桥、于光远等来自全国各地的著名经济学家、教授、学者、计划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共170多人。会议收到的论文有60多篇。

会议首先讨论了我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工作的主要经验教训。大家认为，过去综合平衡工作没有搞好。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犯了“左”的错误。在“左”的思想的指导下，生产建设违背经济规律，脱离我国的实际，超越了客观的可能。大家还列举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问题上存在的一些“左”的表现：搞高指标、高积累；重速度，轻平衡；重基建，轻生产；重生产，轻生活；把实事求是、留有余地的综合平衡斥之为消极平衡，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和国民经济的重大损失。

对于发挥地区优势和全国综合平衡的关系问题，与会同志专门进行了讨论。他们认为，一个地区的优势究竟是什么，只有从全国范围内，把它放在国民经济的全局中才能够看清楚。如果把发挥地区优势这个方针仅仅理解为利用本地区的有利条件来给本地区增加经济收入，这是一种误解。如当前出现的大厂吃不饱、小厂到处搞，盲目办小烟厂、小酒厂等现象，就是没有正确地贯彻发挥地区优势的表现。有的同志明确指出，地区优势的发挥应该起到提高全社会生产的经济效果，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

与会同志还讨论了在今年国民经济调整中，如何搞好综合平衡的问题。他们认为，当务之急是压缩基本建设规模，消灭财政赤字，同时要调整好农轻重、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强调要加快发展农业、轻工业，降低重工业的比重。不过在调整积累与消费比例关系时，不能操之过急。有的同志还提出要注意解决调整中出现的新问题。

中央军委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

会议于1月6日至12日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央纪委第三次贯彻《准则》座谈会的精神，讨论通过了《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任务和职权范围的暂行规定》，研究安排了1981年的工作。

会议由军委纪委书记甘渭汉同志主持。

中央军委负责同志耿飚、韦国清、杨得志、王平出席会议并讲了话。

军委负责同志指出，当前，我们的国家要在经济上实行进一步的调整，在政治上实现进一步的安定，这是我国经济和政治的唯一正确的方针，也是部队各项工作的指导方针。纪委要认真学习和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要以身作则，做搞好党风和遵守党纪的模范；处理问题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注重多方核实，不要搞错；要秉公办事，铁面无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会议认为，军委纪委的根本任务，是在部队中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搞好党风，保证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军委的决议、指示、命令的贯彻执行。1981年的工作主要是：(一)结合实际，认真学习和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并把这一点作为当前工作的重点。(二)继续抓紧《准则》和关于军队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规定的贯彻执行，坚持不懈地纠正各种不正之风。(三)结合部队中心工作和各项任务，如精兵简政、教育训练、战备工作、增产节约等，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严肃党纪，保证各项任务的完成。(四)继续做好对违反党纪案件的检查处理工作和来信来访工作，认真按照党的政策办事。(五)加强各级纪委的自身建设，充分发挥纪委的战斗作用。

会议要求纪委的同志坚持真理，敢于负责，努力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到会同志表示要迅速把会议精神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决不辜负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纪委和广大指战员的热切期望。

中国女排在联邦德国不来梅举行的第二届不来梅国际女子排球赛中夺冠

主攻手郎平和副攻手张蓉芳分别获得了第二届不来梅国际赛特设的“最佳攻球手奖”和“最佳防守队员奖”；17岁的朱晓茹还获得了“最佳青年选手奖”。

第二届不来梅国际女子排球赛从1月2日开始，至6日结束。参加这次比赛的有比利时、巴西、中国、古巴和联邦德国队。

曹菊如逝世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党组书记曹菊如，因病于1月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0岁。

1月7日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同志，小心落水》

小心落水，这里所说的水，指腐蚀人们的祸水。有一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极端严重、浸透了剥削阶级思想的人，为了肆无忌惮地谋取私利而又不受惩罚，就千方百计拉我们的同志下水。各级党组织要教育干部提高警惕，小心落水。

拉人下水的人所用的办法，主要有三：一曰贿之以利。只要看中对象，下饵不惜工本。嘴馋的请吃请喝，手软的赠钱馈物。本人不吃这一套，就走夫人、子女

的门子。这些花销，大都是“借花献佛”，挖公库饱私囊。反正抓住一条，你受了我的“礼”，就是欠了我的“债”；我送你“厚礼”，你就不能“薄人”。二曰动之以情。亲戚、朋友、同乡、同学、老战友、老首长等等，都可以利用来拉关系，讨人情。专程拜访，情意殷殷，说不尽的甜言蜜语，什么“亲朋至友，不能一家人不管一家人”，“多年相处，给点照顾不算过分”，等等。直接找不行，就拐弯抹角人托人。三曰毁之以言。如果前两种办法行之无效，就横加非议，乱造舆论，说你“沽名钓誉”，“假装正经”，给你泼点臭水，让你领教“厉害”。精于拉人下水之道的人，善于因人施伎，可以先用其一，也可以多管齐下，一旦把你拉下了水，他就给你出题目，借用你的职权为他营私舞弊开绿灯，举起你的招牌当作他胡作非为的“保护伞”，甚至拉你入伙，跟他同流合污。

本来，拉人下水，特别是行贿之类，常见于旧社会，是官僚、市侩们争权夺利，寻找靠山，互相利用而采取的一种手法。解放初期，不法资本家为了牟取暴利，也搞这一套，向共产党的干部发射糖衣炮弹。这些经过“三反”“五反”已经搞臭了。“十年浩劫”期间，这套令人厌恶的市侩习气又恶性发展，甚至蔓延到一些党员干部身上。值得注意的是，粉碎“四人帮”四年多了，拉人下水的现象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并未绝迹。而在对外交往中，某些外国资本家也施放糖衣炮弹，赠钱馈物，甚至拉人同流合污，营私舞弊。这是一种邪风，也是一股祸水，有逐渐发展之势。它腐蚀党员、干部，败坏党风民风，损害党的威望，浪费国家资财，挫伤群众热情，危及“四化”建设，我们必须坚决加以制止。

形成这股祸水的原因很多，情况相当复杂，要根治它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是，只要全党同志共同努力，加强和改善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严格党和国家工作人员的工作纪律等等，根治这股祸水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事实上，我们也正在这样做。有没有一个可以争取较快见效的良方呢？有，那就是每一个领导同志，自觉遵照《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国家法律法令办事，廉洁奉公，正身黜恶，不受利诱，不徇私情，不怕非难，敢于和善于同拉人下水的恶习进行斗争。这样的好同志各地都有，而且越来越多。党的组织要坚定地支持他们讲党性、拒腐蚀的斗争，及时总结他们遇污水而不染的经验，大力提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品德，决不允许那些搞不正之风的人对他们进行挖苦、讽刺、打击。

有的同志自己不搞拉人下水那一套，甚至看不惯别人那么做，但是，他们不能坚持党性，缺少拒腐蚀的韧性，顶不住这种引诱，经历了一个开始犹豫动摇，然后惭愧不安的过程，久而久之竟愈陷愈深了。这些同志的思想作风同拉人下水者有某种相通之处。比如，他爱占小便宜，不大管得住自己的一个嘴巴和两只手，看到“飞来”之礼容易动心，而“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软”，既然把柄在人家手里，不想干也由不得自己了。又如，自己有太重私情的弱点，有人利用亲朋故旧关系打动自己，就觉得“情面难却”，被人拉到同政策、法纪相对立的地位上去。再如，自己有患得患失的毛病，明知歪风邪气应该顶，但怕“上司难惹”“谤议难听”，为求得个人的眼前安宁或今后前程，也就半推半就地干出“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的错事。这些情况都说明，在端正党风的过程中，一个共产党员必须秉公办事，刚正不阿，如果有了私心，就不可能成为无所畏惧的先进战士，就有成为不正之风的俘虏的危险。

同纠正其他不正之风一样，解决拉人下水和被拉下水的问题，仍然要以教育为主，多做预防工作。但是，对于至今还不听招呼，明知故犯，行贿索贿，违法乱纪的人，必须严肃追究，该执行党纪的执行党纪，该追究法律责任的追究法律责任，该在经济上赔款的责令退赔，而不问他们的职务高低和过去功劳大小。不这样，就谈不上维护党纪国法的严肃性，就不可能把受到严重破坏的党风端正过来。

我们强调严防被人拉下水，决不意味着否定同志之间的正常交往和亲朋之谊，而是要提醒我们的同志，在处理相互关系时必须遵守一个原则界限，即：不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不做违法乱纪的事情，不搞庸俗低级的“人情往来”。在同志之间的相互交往中，经常讲一讲坚持正确的原则，严防剥削阶级思想作风的侵蚀，对干部、对党、对事业都是大有好处的。现在，在我们党内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人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求助于执政掌权的同志，这完全在情理之中。如果来人提出的要求合理合法，就应当本着共产党员的政治责任感给以帮助，按照正当的途径和手续，促进问题的解决，而且在解决问题后决不“图报”。如果提出的要求不合理或暂时办不到，就要耐心进行说服教育。对一些带着“敲门砖”来搞邪门歪道、拉人下水的，那就必须严肃批评，坚决抵制。

共青团中央在江苏镇江召开全国省区市团委书记会议

会议于1月7日至16日召开。会议确定，共青团当前的任务是：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充分发挥青年的突击作用，积极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保证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

团员和干部必须坚决与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

会议传达、讨论了胡耀邦、宋任穷、胡乔木等中央领导同志最近关于如何做好青年工作的意见。到会同

志敞开思想，踊跃发言，会议开得十分活跃。大家认为，党中央确定在经济上实行进一步调整，在政治上实现进一步安定的重大方针，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意愿，也保障了广大青年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前途。会议认为，在这重大的关键时刻，共青团组织必须坚决服从党的领导，共青团员和干部必须坚决和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同心同德，团结全国各族青年沿着党指引的道路奋勇前进。

围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抓好形势教育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

会议认为，各级团组织要根据青年的实际，在做好团的各项工作中，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领先的地位。要紧紧围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抓好形势教育和热爱祖国、热爱党的教育以及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当前尤其要把形势教育提到重要位置上，使青年增强信心，顾全大局，自觉地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在思想政治工作中，要旗帜鲜明地提倡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关系，坚持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青年。要坚决反对和批判崇拜资本主义、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反对和批判损人利己、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反对和批判无政府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要广泛开展以讲文明、讲礼貌、讲秩序、讲道德、讲卫生和提倡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为内容的文明礼貌活动。要继续组织青少年“学雷锋，树新风”，表彰青少年中的好人好事，发扬积极因素，引导青少年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的一代新人。

解决青年的思想问题，要坚持疏导的方针

会议认为，解决青年的思想问题，要坚持疏导的方针。并及时掌握青年的思想脉搏，研究青年的特点和思想发展规律。要尊重、信任、关怀、体贴青年，平等地和他们讨论问题。坚持摆事实，说真话，讲道理，帮助他们掌握观察、分析问题的正确立场、观点、方法，提高他们鉴别是非的能力，使青年真正感到团组织是自己的良师益友。

充分发挥团员、青年在维护安定团结中的积极作用

会议要求各条战线的团组织，要按照经济调整的要求，认真总结新形势下开展“新长征突击手”活动的新经验，在创造经济成果和多出人才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要充分发挥团员、青年在维护安定团结中的积极作用，带领他们坚决打击各种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活动，同结伙走私、偷税漏税、投机倒把、哄抬物价等不法行为和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行为作斗争，坚决抵制和纠正不正之风。团组织要在维护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同时，关心和维护青年的切身利益，积极主动地配合有关方面为青年广开学路，广开才路，广开就业门路，办好文化活动阵地，把当好党的助手和做青年的代表者一致起来。要切实加强团的基层建设，创更多的先进团支部，关心、培养团的干部，普遍开展“做合格共青团员”的教育。

各级团干部要有扎实的作风

会议指出，当前的任务光荣而艰巨，各级团的干部必须有一个扎实的工作作风和正确的工作方法。要经常下去，找干部、积极分子和各类青年谈话，同他们讨论党的路线和政策，讨论看问题、想问题的方法，讨论国家和个人的前途，讨论学习、工作和就业问题，讨论如何发挥青年团组织的作用，也讨论他们提出的具体问题，经常具体地掌握各种青年的思想情绪和要求，多为青年服务。要既帮助青年解决思想问题，又尽可能帮助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同广大青年群众保持最广泛、最密切的联系，在实践斗争中向群众学习，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知识水平，增长自己的才干。

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市场管理打击投机倒把和走私活动的指示》

各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国民经济调整、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各项经济政策的落实，工农业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市场供应有了改善，整个国民经济活跃起来了，形势是好的。但是，由于经济立法和管理工作跟不上，有些地区市场比较混乱，投机倒把和走私活动很严重，直接危害安定团结，破坏经济的调整和稳定。为了进一步发展生产，搞活经济，有效地维护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现对打击投机倒把和走私活动的问题，作如下指示：

（一）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商业和其他有购销活动的单位，都要积极扩大商品流通渠道，按国家计划和市场需要购销工农业产品。扶植生产发展，稳定市场物价。对于违反购销政策和价格政策规定的，要严肃处理。国营的和集体的商业企业，要按照营业执照规定的范围经营。不准抬价抢购物资。在完成调拨任务后，省、市、自治区之间可以组织物资交换，有关部门要准予运输。

工矿企业，必须保证完成国家计划收购任务和履行合同规定。在此前提下，可以自销产品。对工矿企业、社队企业、街道企业的产品销售，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加强辅导和管理。

个人（包括私人合伙）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不准贩卖工业品。有证商贩，可按规定经营日用小商品。

（二）城乡农贸市场对活跃城乡经济起了很好的补充作用，要继续搞活管好，切实做到“管而不死，活而不乱”。国营农、林、牧、渔场，在保证完成国家收购任务和履行合同的前提下，可以自销产品。

机关、团体、部队、学校、企业、事业单位，到农村社队和集市采购农副产品，要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农村社队集体，可以贩运本社队和附近社队完成国家收购任务和履行议购合同后多余的、国家不收购的二、三类农副产品。不准贩卖一类农产品。社员经过生产队同意，在不影响国家收购任务完成的前提下，可以从事个人力所能及（肩挑、手提、人拉、自行车驮）的、允许上市的农副产品的贩运活动。不允许私人购买汽车、拖拉机、机动船等大型运输工具从事贩运。合作商店、合作小组和有证个体商贩，要在营业执照规定的范围内，从事农副产品的贩运活动。

（三）下列行为，属于投机倒把活动：

非法倒卖工农业生产资料；抬价抢购国家计划收购物资，破坏国家收购计划；从国营和供销合作社零售商店套购商品、转手加价出售；个人坐地转手批发；黑市经纪，牟取暴利；买空卖空、转包渔利；欺行霸市、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倒卖计划供应票证和银行有价证券；倒卖金银、外币、珠宝、文物、外货、贵重药材；偷工减料、掺杂使假、以假充真，骗钱牟利；以替企业、事业等单位办理业务为名，巧立名目，招摇撞骗，掠取财物；出卖证明、发票、合同，代出证明、代开发票、代订合同，提供银行账户、支票、现金，从中牟取非法收入。对从事投机倒把活动的任何单位和个人，除按政府规定罚款或没收其财物外，情节严重的，交由司法机关依法惩处。

（四）一切应纳税的单位和个人，都必须照章纳税（包括关税）。偷税漏税和抗拒不交的，要严加处理。农村社队和社员在市场销售自产的应税产品，应按照适用的税率征收工商税。持有社队自产自销证明的，在一定数量内（按各省、市、自治区的规定）可给予免税照顾。

对无证个体工商业户，按“临时经营”税率征税。获利超过限额的，按规定加成征税。

（五）华侨、港澳和台湾同胞按政策规定允许携带、邮寄进口的各种物品，只限于自用或馈赠亲友，不准私自出卖，从中牟利；需要出售时，只能按国家规定的价格，卖给经县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经营的商业收购单位。核准销售上述物品的商业单位只准到指定的商业收购单位进货，不准搞议购议销。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收购和销售，更不准购销走私物品。

要加强对走私活动特别是海上走私活动的查缉。一切船只，包括渔船在内，逃避海关管理，非法买卖商品，按走私处理。公安部门和海防、边防部队应协助海关查缉走私活动。在东南海上要组织缉私联防。

沿海、沿边各省、市、自治区，特别是广东、福建、浙江、上海、广西、云南等，要采取有力措施，坚决取缔黑市交易，打击走私活动。

对国家干部、现役军人参与走私，或利用职权徇私受贿的，必须从严处理。

（六）一切机关、团体、部队、国营和集体的企业、事业单位，民航、铁道、交通、邮政、银行等部门和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都要采取措施，防止走私、投机倒把分子利用国家的、集体的运输工具和金融流通渠道，贩运走私、投机倒把物品和汇兑赃款。

（七）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强对市场管理和打击投机倒把、走私活动工作的领导。充分发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海关、税务机关、公安机关等有关部门的职能作用，密切配合，统一步调。同时，要广泛宣传，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加强监督。对阻挠、抗拒检查，冲击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海关、税务机关、公安机关，或者围攻、辱骂、殴打检查人员的违法犯罪分子，必须依法从严惩办。各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在接到本指示后，应立即研究部署，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国家统计局发布 1980 年全国工业产值数据

据新华社报道：从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家统计局获悉，1980 年我国工业生产在调整中稳步增长。

1980 年工业总产值比 1979 年增长 8.4%，超过了原定增长 6% 的速度。其中，轻工业增长的速度超过了重工业。轻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已由 1979 年的 43.1% 提高到 46.7%，重工业的比重由 56.9% 下降到 53.3%。全国 100 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 83 种产品完成和超额完成了产量计划。产品质量提高，花色品种增加。60 项主要质量指标中，有 48 项指标比上年提高。

这些重要成果的取得，是由于各地区、各部门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调整国民经济，改革经济管理体制，落实了各项经济政策。

由于调整能源工业内部的比例关系，1980 年的能源产量比 1979 年下降了 2.6%。全国工业战线大力开展以节能为中心的技术改造，从降低消耗中求得增产。

1980 年部分行业面临生产任务不足的困难。这些行业的干部工人认真调查社会需求，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搞好市场调节，努力增加生产，克服困难。

各地工业部门 1980 年还采取多种措施，努力扩大市场短缺产品的生产能力，以满足社会和人民生活的需要。重工业部门根据市场需要积极调整产品结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